



外研社翻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历史上的翻译家

(加) Jean Delisle (加) Judith Woodsworth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研社翻译教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历史上的翻译家

(加) Jean Delisle (加) Judith Woodsworth 主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7-7430

Original edition: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By Delisle, J. and Woodsworth, J. ©2012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or 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上的翻译家：英文、中文 / (加) 让·德利尔 (Jean Delisle), (加) 朱迪斯·伍兹沃斯 (Judith Woodsworth) 主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4

(外研社翻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ISBN 978-7-5135-9951-1

I. ①历… II. ①让… ②朱… III. ①翻译家—人物研究—世界—英、汉
IV. ①K81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5421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负责 王丛琪
责任编辑 张丽娟
封面设计 彩奇风
版式设计 吴德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951-1
定 价 99.9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99510001

筚路蓝缕，牢记历史 ——《历史上的翻译家》导言

2017年，我国的翻译学学科建设走过了30年艰苦历程，迎来了硕果累累但又任重道远的新阶段。30年前，全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举行，揭开了大规模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学学科理论的序幕，标志着翻译的理论研究终于进入了学术殿堂，也见证了翻译学学科建设蹒跚起步。2017年，适逢我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创设10周年，职业化翻译人才培养的规模和成就举世瞩目。当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规模，具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其研究者便会产生自觉的历史意识，感到全面总结过去的必要（姚小平，1995）。立足于已经取得的可喜成就，我们更要清醒地意识到，翻译学学科地位的日益提升和学科发展的日臻完善都离不开对翻译的过去、今日及未来的不断深入的认识。

作为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翻译史研究自本世纪以来受到译学界的持续关注，已成为国内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从已有研究成果的统计来看，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呈现出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首先，根据笔者针对国内发行的35种外语类期刊中翻译史研究学术论文的统计显示，1949–2000年间翻译史研究期刊论文很少，而2000–2016年间期刊论文数量猛增至约700篇，其中有近600篇论文发表于近10年。同时，自马祖毅（1984）出版我国第一部翻译史专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开始，截至2016年，我国已出版翻译史著作约190部。再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1993年首设翻译研究项目，截至2016年翻译史研究项目立项超过100项，成为占比最大的翻译研究类国家社科项目。最后，从博士学位论

文来看,翻译史研究在国内翻译研究博士论文中占 33.5% (1992–2016),受到了历届翻译研究博士生的青睐。

除成果统计所反映出的翻译史研究的快速发展之外,翻译史的研究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一方面,一批批国内学者、博士生加入到翻译史研究的人才梯队中,不断探索翻译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翻译史研究的跨学科本质决定了其研究队伍的多样性,历史学、社会学、汉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研究者的加入也壮大了翻译研究的队伍。与此同时,针对翻译史研究年轻学者的培养工作不断加强。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已连续主办五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为有志从事翻译史研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年轻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与国内学者对翻译史研究不断高涨的研究热情不符的是,目前我们对国外翻译史研究成果的掌握尚显不足。同时,翻译史研究中科学方法论的缺失使许多研究流于对史料的单纯挖掘与描述,缺少深入探究史料背后的意义及其对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乃至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意义。鉴于以上情况,国际翻译家联盟(简称“国际译联”,FIT)翻译史委员会主任让·德利尔(Jean Delisle)和副主任朱迪斯·伍兹沃斯(Judith Woodsworth)联袂主编的《历史上的翻译家》为有志从事翻译史研究的学者及研究生提供了史实资源、研究思路和方法参照。1963年,国际译联在克罗地亚召开第四次大会,一致决议编写一部世界翻译通史,但该项目未能立刻受到重视。1966年,国际译联决定成立翻译史委员会,全面开展这一“世界翻译百科全书”(worldwid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的撰写工作。搜集史料及撰写此书的耗时之长、工作量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译联的支持下,来自全球20个国家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书的撰写、翻译和校订工作,最终于1995年出版英文版和法文版。由于其史料丰富性和学术权威性,本书出版不久后便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此后,编者对该书进行了补充修订,2007年出版法语修订版,2012年英语修订版问世。通过对比1995年和2012年的两个英文版本,可将英语修订版的补充修改内容归纳如下:1)内容扩充:第4章新增对机器翻译历史与发展的讨论,第5章新增“21世纪对翻译的重新界定”,第6章新增“东方宗

教典籍的翻译”，第8章新增“词典在欧洲的发展”“术语词典”“词典的演变”等内容；2）信息更新：如全球语言和翻译协会数据的更新、参考文献的新增；3）观点的客观表述：如第4章小节标题修改了“古印度作为世界知识中心”的表述，强调历史上知识中心的多极化；4）争议信息核实与说明：如第4章中针对“托莱多翻译院”的性质和范围的质疑与讨论；5）术语规范：如“unilingual dictionaries”改为“monolingual dictionaries”；6）排版调整：如删除“推荐阅读”部分、更换插图。

本书的两位编者德利尔和伍兹沃斯在翻译研究上建树颇丰。德利尔获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博士学位，1974–2007年间任教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现任荣誉教授。他先后参与出版了约20部翻译史或翻译教学学术著作。伍兹沃斯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发表了大量文学研究、翻译史研究学术论文。她曾先后担任三所加拿大大学副校长，现任教于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除此之外，伊夫·甘比尔（Yves Gambier）、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等翻译研究国际知名学者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工作。翻译界和史学界学者倾力合作，不仅保证了该书在翻译史研究上的权威性，同时也使它跳出翻译研究的范围，通过剖析翻译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作用，勾勒出世界文化交流史的蓝图。国际译联前任主席让-弗朗索瓦·乔利（Jean-Francois Joly）在该书的前言中写到，这一伟大著作“展开了世界翻译史的画卷，带领读者踏上了广袤无垠的未知领域（mapping the vast but uncharted territory of the univers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内容概要

每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应有自己的学科史。作为一门新生学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翻译史研究有着尤为特殊的学科意义（蓝红军，2016：5）。翻译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为翻译活动、翻译事件、翻译家、翻译机构及翻译流派（许钧、朱玉彬，2007）。本书筛选了历史上极具影响意义的翻译家个人和群体，以与其翻译活动息息相关的不同领域为横轴，以时间发展脉络为纵轴，深入、细致地挖掘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翻译

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本书正文部分共分为九章，分别记述了翻译家与字母发明、翻译家与民族语发展、翻译家与民族文学的出现、翻译家与知识传播、翻译家与权力、翻译家与宗教传播、翻译家与文化价值传递、翻译家与词典编纂以及口译者与历史的创造九大主题，内容涉猎翻译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和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编者在前言中就该书所在项目的历史起源、发起机构及撰写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与突破作了简要介绍。该书并非大而全地尽述世界翻译史，而是筛选了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翻译家，探究他们在文化、历史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就像是用板刷完成的画作，笔墨下的飞白一定会留有空隙。

人类历史源远流长，但文字记录的出现时间却不长。第1章《翻译家与字母发明》从公元前4000多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出发，探究译者如何通过翻译活动催生字母的创造，从而通过文字记录人类文明发展史。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字母的出现具有历史变革意义。自此以后，字母的使用不再是贵族阶层的特权，腓尼基字母随着航海、商贸往来活动的增多在地中海沿线国家的普通民众中传播开来，并衍生了后来的亚兰字母、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等。在文字发明上，译者的作用不容忽视。本章通过介绍四位翻译家的翻译活动，论述翻译在文字发明、知识传播和唤醒民族语言意识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包括：1）罗马帝国哥特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乌尔菲拉（Ulfila）和哥特字母的发明；2）学者圣梅斯罗布（Mesrop）的圣经翻译和亚美尼亚字母的发明；3）西里尔（Cyril）和迪乌斯（Methodius）的圣经翻译和古斯拉夫字母的发明；4）传教士、翻译家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与加拿大土著语言克里语字母的发明。

翻译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文本的转换，它还对语言的演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2章以英语、法语、瑞典语、德语、巴雅语、希伯来语为重点，讲述了翻译家在发展、丰富和推动民族语言发展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语言，英语的发展离不开日耳曼族部落、维京人、诺曼人的相继入侵。在征战的过程中，古英语通过文本的翻译吸收了拉丁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等不同语言的字母、语音、语法等语言因素。阿尔弗雷德大帝

(King Alfred)、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杰佛利·乔叟(Geoffery Chaucer)、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圣经》及诗歌翻译活动促进了古英语与外来语言的杂合;法语的发展经历了罗曼语与古法语(4世纪到13世纪)、中古法语(14世纪到16世纪)和近代法语(17世纪以后)三大阶段,其中宗教、文学翻译促成了法语的丰富和规范;“德语的工艺师”(artisan of the German language)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用普通民众的语言翻译《圣经》,不仅引领了宗教改革、推动了德语的发展,其翻译原则也对之后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瑞典这样的语言使用人口较少的北欧国家,翻译对语言的影响尤为突出,瑞典语《圣经》译本集中反映了翻译对语言演变所起的关键作用;喀麦隆巴雅语为代表的非洲民族语的演变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1971年成立的巴雅翻译中心对民族语发展、巴雅文化及哲学思想的保存与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古希伯来语到犹太复国主义推动下的希伯来语复兴中,翻译推动了希伯来语的流传,同时将美洲、中东、地中海文化引入希伯来文化。代表人物有孟德尔·莫克·弗里姆(Mendele Moker Sforim)、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和亚伯拉罕·什隆斯基(Abraham Shlonsky)。

如同宗教文本翻译,文学翻译中的“忠实”与“创新”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讨论话题,正如诗人、翻译家乔叟对翻译与创新、模仿与替代、引入与吸收之间关系的比喻:“犁旧地、收新粮”(ploughing old fields to produce new corn)。本书第3章讲述了翻译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一方面,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对希腊和拉丁文明的崇敬、对新世界的征服和《圣经》在民族语中的传播都大大推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活动,促生了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和民族意识。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荷兰著名作家、翻译家约斯特·凡·德·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他不仅用民族语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同时还翻译了大量意大利语、拉丁语散文和希腊语戏剧作品。他所翻译的讽喻诗、悲剧、颂词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带来灵感,成为荷兰“黄金时代”(the Dutch Golden Age)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民族文学的独立身份逐渐确定后,文学翻译活动又进一步引导了民族文学的复苏和革新。17世纪末18世纪初莎士比亚作品在欧洲的译介对当时法国、

德国、波兰、荷兰等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除此之外，翻译活动推动了爱尔兰、苏格兰、阿根廷和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意识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后殖民文学翻译的原则超越了传统的二分法，翻译被看作是杂合、介入的过程。

第4章《翻译家与知识传播》从中国、印度、巴格达、中世纪西班牙、北欧国家及机器翻译六个主题出发，介绍了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在知识的产生及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中国和古印度作为人类文明两大发源地源远的翻译历史、阿拉伯巴格达翻译院和中世纪西班牙的“托莱多翻译院”（School of Toledo）、北欧国家通过翻译打破自我封闭的文化壁垒，以及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的关系及未来发展。翻译与知识传播的关系主要体现在：1）译者通过翻译过程中的术语借用与创新为目的语注入了新观念、新知识，丰富了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系统；2）知识由原来在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梵语等传统学术语言之间的传递扩展到从传统学术语言向民族语的传播；3）翻译在推动知识传播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的民主化；4）由于技术的不断革新，书籍已不再是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纸媒的多样化、数字技术的涌现进一步扩大了知识传播的需求，也为译者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第5章《翻译家与权力》通过对西方翻译史上翻译家和翻译事件的论述探索翻译家与权力中心的联系。首先，政府间各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加大了对翻译的需求，在对犹太复国主义有着深远意义的《贝尔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中，“犹太民族之家”（national home）一词的翻译典型地反映出翻译与国家权力及民族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权力在翻译中的影响也反映在中央权力对翻译机构与翻译活动的赞助，包括巴格达翻译院（the Baghdad School）、中世纪西班牙的“托莱多翻译院”（School of Toledo），以及法国国王资助下的拉丁文哲学、科学著作的译入活动。除赞助人的权力影响外，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被赋予一定的权力。在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和苏联时期，翻译成为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引入新价值观的工具。最后，本章还介绍了美洲大陆殖民文化下的翻译与权力，以及历史上男性、女性译者权力的对比和变化。

世界上主要宗教的译本极为丰富，但翻译文本在不同宗教中有着不同的

神学地位，翻译策略也不尽相同。第6章《翻译家与宗教的传播》详述了犹太教、基督教传播广泛的典籍翻译，同时介绍了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的译经活动。宗教文献翻译中，译文与原文的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流动的，有的时期译文是对原文的忠实再现，而在其他历史时期译文则相对自由，甚至替代原文的地位。例如，古希腊语圣经译本《七十子希腊文本》曾一度取代希伯来语原文，成为基督教圣经《旧约》的范本。此外，宗教文献的翻译时刻反映着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宗教译本的文学和文献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第7章《翻译家与文化价值传递》带领读者从12世纪中的西班牙游历至20世纪中的法国，内容主要包括八个部分：1) 12世纪西班牙翻译家的译入活动和19世纪巴黎翻译家的外译活动；2) 伊斯兰经典《古兰经》的翻译和宗教的多元化；3)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哲学、史诗和历史文本的译入活动；4) 孔斯特(Coste)哲学著作的翻译和欧洲启蒙思想；5)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翻译活动；6) 19世纪法国哥特小说的翻译；7) 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活动和严复的翻译思想；8) 20世纪美国科幻小说的翻译和法国新文学体裁的诞生。

第8章探索了翻译家和词典的关系及翻译对词典编纂的贡献。历史上译者与词典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译者是词典的使用者，而另一方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借用和创新词汇推动了词典的编纂。本章内容主要包括单语词典的演化、词典在不同文化中的发展历史、中世纪拉丁语—法语双语词汇表和双语词典的出现、文艺复兴至今欧洲的翻译活动和词典发展、双语及多语词典的历史和今天，以及计算机技术辅助下的术语词典编纂。

口译活动伴随着早期不同部落的往来与交流而出现，但由于史料的缺失，口译史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第9章《口译员与历史的创造》回顾了口译工作方式和分类的历史演变，重点介绍了传教活动、贸易往来、领土扩张、对外征战和政治外交中口译员的背景、地位及其口译活动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尽管口译史研究中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随着上世纪以来口译职业化的出现和发展，口译教育、口译职业化、口译研究并驾齐驱，人们对口译员身份地位和历史影响的认识也逐渐加深。

特色与学术贡献

纵览全书，其涵盖主题之广阔、史实内容之丰厚是本书最为鲜明的特点，作为翻译史百科全书可谓实至名归。本书的主要特色可从研究类型和研究视角、叙事风格、中国元素和学术贡献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1. 研究类型和研究视角

翻译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和取向、深度和广度使其在本质上无法仅仅停留在翻译研究本身（方梦之、庄智象，2016：1）。翻译史研究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按照研究的主要对象可划分为国别研究、时期研究、译者研究、理论研究、翻译机构和出版社翻译贡献研究、专题分类个案研究六大类（许钧、朱玉彬，2007）。安东尼·皮姆（Antony Pym）在讨论翻译史研究方法时，提出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既不是翻译文本，也不是社会语境和语言特点，而是肩负社会责任的译者，只有通过对译者和他们所在的社会环境（客户、赞助人）读者的研究，读者才能理解特定时空背景下具体翻译活动（Pym, 1998：xxiii-xxiv）。本书正是从这样的考虑出发，聚焦具有不同特定关系的翻译家个体和群体，探索不同时空、不同地域译者个体和群体对文化、宗教、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总体来看，本书从跨主题、跨时空和跨文化的不同视角出发，使研究不拘泥于史料的描述，翻译家的形象被刻画得更加立体、鲜活。首先，从章节安排可以看出，九大主题是本书切入翻译家研究的主要视角。编者以语言文字、民族文学、科学知识、宗教信仰、文化价值等专题为切分单位，所选主题既有独立的代表性，又相互关联，如宗教传播与民族语言、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在论述时相互照应。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全文掌握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的历史脉络，亦可根据学习要求和个人兴趣选取某一章节细读、深挖。其次，时空视角对任何史学研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翻译家研究也不例外。本书的章节安排虽以专题为主线，从第1章到第9章虽然每个主题是平行独立的，但总体上还是遵循了时间发展的脉络，从两河流域的翻译与字母发明逐渐过渡到20世纪中期的口译职业发展史。从章节内部来看，编者按照历时的思路，选择不同历史阶段具有在典型主题下贡献突出的翻译家，结合其

区域性翻译活动详述。同时，由于 20 个国家 50 位学者倾心撰写，本书所涉及内容的空间跨度大，地理分布上涵盖了当今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主要国家。除此之外，翻译史研究必须注意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结合（穆雷，2000）。本书所选择的翻译家和他们的翻译活动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译史研究的跨文化视角，本书摒弃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同时介绍了以宗教、哲学翻译为典型活动的中国古代文明，多文化、多语言的古印度文明以及以巴雅文化为代表的非洲部落文明等，凸显了译者在文化、思想传递过程中的使命感，也体现出作者对翻译史进程的敏感把握。

2. 叙事风格

由于翻译家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此类研究一方面不可能做到“大而全”，另一方面不能陷入过于“小而精”的细节描述，无法将“史”与“证”有效结合起来。从这一点来考量，本书较好地实现了以叙为主、寓论于史的学科史研究思路。首先，作者基本围绕“何许人？为何译？译什么？怎样译？译效何”的五大问题（方梦之、庄智象，2016：4），清晰地叙述了翻译家的生平、翻译活动（典型翻译事件或作品）、翻译思想、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社会影响。其次，在描述史实的基础上，作者在每个章节的开始和最后部分加入了对主题社会、历史背景的铺垫介绍及对翻译家和翻译活动社会影响的充分讨论，如第 3 章在讨论翻译家对民族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时，作者将翻译研究与新古典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探究翻译家从事该翻译活动的动机、原则、策略及贡献。

在语言表述上，该书较少对史料大段地直接引用，而是采用第三人称的表述方式和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表达，有声有色地娓娓道来，增加了翻译史研究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排版上，本书配有 24 副插图，注释采用了尾注而非脚注，尽可能地保证了简洁、流畅的阅读体验。

3. 中国元素

中国作为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已走过了五千年的发展历程。翻开中国历史的悠长画卷，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与朝代更迭、民族兴亡息息相关。对中国翻译家及翻译发展史的多处着墨是本书的又一特色。从内容安排上可以看出中国的翻译活动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例如，第

4 章《翻译家与知识传播》、第 6 章《翻译家与宗教传播》对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家和翻译活动作了详细的介绍,主要包括:1)早期的知识与文化从古代中国到古希腊、古罗马的传播,其中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译作的保存与流通;2)从东汉到近代中国的佛教典籍翻译活动,文中记录了安世高、鸠摩罗什和玄奘等翻译家的翻译成果和翻译思想,特别介绍了玄奘在大雁塔主持译场以及当时口传、笔授、证义的合作和集体译经模式;3)东汉末年到明清时期的实用文体翻译活动,主要为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翻译家对西方医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的译介,其中包括对华蘅芳、傅兰雅、林则徐、魏源等科学翻译先驱的介绍和讨论。

除对古代及近代中国宗教、科学知识、文化价值等翻译活动的关注之外,在 2012 年的修订版中,还增加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一轮翻译高潮的讨论,国内实用文体翻译活动的迅猛发展、中国翻译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已成为世界翻译史研究中新的关注点。另外,本书的 24 副插图中就包括了玄奘(图 12)、严复(图 15)、大雁塔(图 22)共 3 副插图。由此可见,国际译学界在从事翻译史研究时,越来越重视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上的传播与影响,国内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国际译学界的认可。

4. 学术贡献

1972 年霍姆斯发表了翻译研究里程碑式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勾勒了翻译学研究领域地图(Toury, 1995: 10)。译学界针对这一框架在过去 40 多年中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认为翻译史研究的缺失是主要问题之一(Chesterman, 2014)。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支柱之一,也是翻译学和史学的交叉研究领域(穆雷、欧阳东峰, 2015)。因此,本书所关注的人物史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翻译学学科史学意识的巩固和学科建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译史研究虽然从本世纪开始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的翻译史著作、论文大多以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家为核心对象,如《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 1989)、《1949-1966: 我国英美文学的翻译概论》(孙致礼, 1996)、《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 1998)、《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任淑坤, 2009)等。要推进翻译史

研究的全面发展，必须挖掘与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学传播等相关翻译史料和翻译家，实现从文学翻译史向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转变（方梦之、庄智象，2016）。本书关注翻译史的整体，力求勾勒出文化交流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并以此理出一条关于世界各国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及其意义的线索（泰戈，1997），给国内翻译史研究以一定借鉴作用。此外，本书以翻译家在翻译史发展中的作用为主线，对国内目前正在大力开展的翻译家研究项目有针对性的参考意义。

另外，翻译史研究必须尊崇历史学研究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方法，本书所运用的翻译史研究方法对研究者翻译史方法论意识的培养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史学研究方法是“在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搜集、整理、运用、分析和提炼历史事实，以实现一定认识和研究目的、探寻历史规律、解决研究问题”的方法（穆雷、欧阳东峰，2016：115）。史学研究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具体到翻译史研究的一般分析方法，本书综合体现了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历时比较分析法、历史综合分析法五类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例如，本书第4章通过针对六个不同历史时期知识传播中翻译的主体、翻译的主要内容、社会影响和技术的使用进行历时的比较分析，而第5章则根据译者所处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采用阶级分析法探讨译者与赞助人、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翻译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翻译家是历史的亲历者，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时刻和重要事件，如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都离不开译者的参与。另一方面，翻译家更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文字发明到宗教、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译者的工作从未局限于翻译活动本身，许多优秀的翻译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家、宗教改革家、文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回望历史，译者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有些伟大的翻译家在履行知识传播、文化交流的社会责任时，也遭到了不平等的对待，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今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做到牢记历史，以史为鉴。

总体来看，本书无疑是一部史料丰富、内容系统、讨论充分的翻译家研究巨作。它不仅可以作为翻译研究学者、研究生必读的经典书目，同时也为历史学、比较文化、比较文学及社会学研究爱好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参考资

源。当然，由于篇幅限制，该书所涵盖的主题有一定的选择性，每一主题的讨论也无法做到十分的深入细致，读者可根据研究需要进一步阅读翻译史专题研究的相关文献。

穆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王莹 深圳大学

参考文献

- Chesterman, A. 2014.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or studies. *Hermes*: 13-22.
- Pym, A. 1998.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方梦之、庄智象，2016，翻译史研究：不囿于文学翻译——《中国翻译家研究》前言，《上海翻译》（3），1-8/93。
- 蓝红军，2016，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论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中国翻译》（1），5-11/124。
- 穆雷，2000，重视译史研究，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中国翻译》（1），44-48。
- 穆雷、欧阳东峰，2015，史学研究方法对翻译史研究的阐释作用，《外国语文》（3），115-122。
- 泰戈，1997，《历史上的翻译家》出版，《世界文学》（1），308。
- 许钧、朱玉彬，2007，中国翻译史研究及其方法初探——兼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外语教学与研究》（6），451-455/481。
- 姚小平，1995，西方的语言学史学研究，《外语教学》（2），1-7。

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Great strid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particular, has burgeoned, providing fertile ground for students and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to tackle topics with breadth and depth through time and across geographical areas.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and of translators, has a robust past, a vibrant present, and a promising future. In this context,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remains a useful tool for a variety of readers – students,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working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 and continues to be of interest to scholar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nd the wider public.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reprinted version in 1997 that contained a few straightforward adjustments, however, there has not been a thorough revision. In 2007, Jean Delisle issued a new French version of the book, *Les Traducteurs dans l'histoire*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in which he corrected errors that had been identified by readers and critics, made improvements in both form and substance, and provided updated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It was clearly time for a new English edition with current information, corrections and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not the least of which recognizes new thinking 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the first edition, we referenced the nineteenth-century historian Leopold von Ranke who sought to “determine what actually happened” (Delisle and Woodsworth 1995: 245). Academic historians have long since moved beyond the Rankean paradigm, and approaches to history continue to evolve. In our time, the very notion of objectivity has been set aside in favour of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To begin with, the range of possible objects of inquiry is limitless;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discipline, as well as the methods and nature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re all open to debate. A work of history can be compared to a musical composition, as in Paul Cohen's account of the Boxer Uprising, which he has called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building his narrative on history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Cohen 1997). A weaving together of different strands, drawing on diverse stores of evidence, history is a creative, interpretive act, to some extent an act of imagination. Not unlike translation, in other words.

This all has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and the various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history all have relevance for what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seeks to accomplish. Whereas traditional history tended to look at momentous events and the "great deeds of great men", recent decades have s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focus on ordinary people and attempt to tell "history from below". Historians of translators are adopting this vantage point to good effect. For millennia, translators have accompanied the "great men" in their "great deeds", but they have been defined by their subordinate status (as captives, slaves or ethnic hybrids, for example). Yet, their soci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identities have allowed them to cross borders, negotiate across cultures and contribute to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Just as decolonization, femin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have transformed historical writing, so, too, have they made their mark on the narratives of translati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agent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long with the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that define them, can yield compelling and textured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Once reliant on archives and